



在泰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单靠选举式民主不但不能让人民满意,甚至已经失控

就这样,发生在既没有“历史背景”又缺少“基础条件”的泰国的西式民主一开始就水土不服,选举式民主越频繁,政治关系就越紧张。选举式民主没有提升泰国的国际形象 and 经济发展,而是相反。

在这种背景下,各派都主张搞政治改革以稳定政局。但是,改革方案如何设计? 占泰国人口30%的城市中产阶级提出“众议院议员30%靠选举,70%靠任命”,这一方案恰恰与泰国人口阶级比例相反,因此是反动的,行不通的。但是,简单的按人头的选举式民主也不会有更好的前景。这就需要双方的政治妥协和高度的政治智慧,彼此让渡自己的一些利益,甚至是核心利益。自己割自己的肉,谈何容易! 城市中产阶级即便能和农民阶级达成妥协,第三方政治势力即王室一军事集团会自动退出政治舞台吗? 至少我们局外人看不到这种希望。

泰国中产阶级所搭乘的第三波民主化这趟顺风车,已经把泰国拉向迷途。“选举式民主”最初是中产阶级推动的,而当底层民众通过“选举式民主”进入政治舞台而危及他们的利益时,“选举式民主”的推动者又转而反对民主。这就是政治的吊诡之处。

作为社会平等化大势的民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民主的本意还是人民主权,是事关人民幸福的大事,因此不但民主的形式很重要,更重要的还有实质民主即人民得到什么,人民是否满意。在泰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单靠选举式民主不但不能让人民满意,甚至已经失控。因此,时代呼唤制度创新,以新的制度形式来实现民主的善业。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西式民主的泰国之殇

——兼析“选举式民主”水土不服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

杨光斌

本文语粹

●现代政治和传统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作为现代化形式的西式民主是基于其两千年连续性传统的内生性演化而来,而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照搬、移植一种外生性制度,自然会水土不服,成功者少有。

●“选举式民主”是同质化社会中的平等化的产物,而在存在宗教冲突、民族矛盾的异质化社会和贫富极化的不平等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比如泰国,数人头的选举政治必然会加剧业已紧张的社会矛盾,政治动荡难以避免。

●“选举式民主”最初是中产阶级推动的,而当底层民众通过“选举式民主”进入政治舞台而危及他们的利益时,“选举式民主”的推动者又转而反对民主。

泰国政治乱象只不过是众多国家西式民主水土不服的一个案例而已。自1932年实行君主立宪制,泰

国共发生大小军事政变19次;1992年民主化以来,军事政变依然是家常便饭,2006年推翻他信政权,此次又推翻他信的妹妹英拉政权。泰国周期性动荡的原因很简单,选举式民主在泰国既与其历史文化传统即达尔所说的“背景条件”相抵牾,又没有达尔所说的“基础条件”做支撑,结果民主政治在泰国必然是一种难以自我运行的制度。

泰国政治的“背景条件”是什么呢? 一句话,就是王室一军事集团组成的保皇派政治联盟,二者彼此需要,互为条件,形成了一个长达80年的生命共同体。泰国的现代政治起始于1932年军事政变所实行的虚位君主立宪制。此后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国王在政治上都靠边站。但是,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和人民政治权利意识的提升,军人政权越来越扛不住民众政治参与的要求,于是军人在1960年把国王推向前台,并在刑法中规定“冒犯君主罪”,使得国王从此享有至高无上的威严和政治地位。在1992年泰国民主化过程中,普密蓬国王又成功地调和了示威民众和军方之间的冲突,国王作为政治稳定器的作用进一步突显。但是国王的地位离不开军队的守护,而保证军人利益自然也就成为国王的优先议程。

也就是说,泰国这样的“背景条件”为以平等化为核心特征的选举

式民主设置了一个前提,即王室一军人联盟凌驾在民选政府之上。在2006年推翻他信政府以后,2007年的宪法又废除了参议院选举,改为由国王和军队直接任命参议员;而参议院又任命总检察长及其属下的宪法法院。这样,民选政府头上又有了第二道紧箍咒,结果一个又一个民选政府被所谓的宪法法院判定违宪,2008年判决沙玛总理上电视表演厨艺违宪,2014年判决英拉总理任命自己的内阁成员违宪。

泰国的“背景条件”让选举民主产生的民选政府难以维系,“基础条件”的缺失让人民内部冲突不断

我们知道,选举民主是社会平等化的产物,因而其表现形式就是一人一票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地位的平等权。抓住战略机遇,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实现重大突破。京津冀地区面临一系列重大机遇,如中央将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机遇,这有利于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和行政区划的藩篱,站在国家战略和区域整体发展的层面,对京津冀区域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并在财政体制、投资体制等方面进行政策配套,这无疑给全面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最有力的制度保障。北京率先迈向后工业化社会,其产业转移与升级,城市功能疏解以及京津冀三地正在进行的空间结构调整,都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契机和条件。我们应抓住这些重大的战略机遇,在全国率先走出一条“协同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发展互补互促、资源要素对接对产、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联防联控”的路子来。

但是,在社会结构关系紧张而

受“面子工程”政绩观驱使,城镇地下基础设施成了短板——

“里子工程”政绩观值得倡导

刘武俊

“面子工程”,多是一些实实在在的“里子工程”,这才是总理“里子观”的潜台词,也应当成为各地城市建设者和管理者的基本共识。

排污设施、下水道、地下管道网线等地下基础设施,被称为“城市的良心”,往往是维系一个中心城市正常运转的命脉,也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然而,在片面追求“高大上”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的政绩观驱使下,这些“里子”往往沦为被官员遗忘的角落。

筑牢城市“里子”,应当树立“想升官先得修好下水道”的理念,将“里子工程”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指标,倒逼各级政府官员切实抓好“里子

工程”建设。去年国务院办公厅曾下发《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加强城市排水防涝工作行政负责制,将其纳入政府工作绩效考核体系。将排水防涝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让下水道成为政府官员升迁绕不开的要道,有利于强化各级政府官员的责任意识,转变政绩观念。在加强政绩考核的同时,也要强化问责机制,将问责的责任落实到地下基础设施的规划者和管理者。

想升官先修好下水道,铺好地下管线,先筑牢“里子工程”,这才是值得大力倡导的“里子工程”政绩观。

(作者为司法部《中国司法》杂志总编)



理论前沿

民主无疑是人类最值得追求的一种善业,但是如何实践民主? 冷战时期,为了对抗来势汹汹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即当时世界性的民主运动,美国人必须证明自己就是民主的典范,于是熊彼特建构了“选举式民主”——民主就是公民选举产生政治家的过程,如何立法和决策则不是民主政治的范畴。在两极对立的冷战时期,社会科学彻底二元对立化,有无“选举式民主”就成为判定有无民主的唯一标准。从南欧到苏联东欧,从南美到东亚—南亚的“第三波民主化”,其实就是纷纷搞了作为西式民主核心制度的“选举式民主”,其中泰国也于1992年搭上了这趟顺风车。

根植于异域的现代政治形式与自己的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是有冲突的

包括泰国在内的四十多个转型国家,为什么善终者少之又少? 大多数国家要么陷于国家治理失效如菲律宾、墨西哥,要么国家分裂如苏联、南斯拉夫、乌克兰,要么出现周期性政治动荡如非洲很多国家和泰国。这是为什么?

现代政治和传统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作为现代化形式的西式民主是基于其两千年连续性传统的内生性演化而来,而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照搬、移植一种外生性制度,自然会水土不服,成功者少有。

作为现代政治形式的民主首先离不开其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比如法治至上和妥协精神。当2000年小布什和戈尔产生选举僵局以后,美国最高法院一锤定音,戈尔及其支持者心有不甘但接受裁定。这是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经典再现,全世界对此印象深刻。不仅如此,老生常谈的

提升公平正义,要重视四个部门法:刑事法、税法、侵权责任法和行政诉讼法——

法治中国的四维

季卫东



独家观察

过去一年来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为树立法制权威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营造了适宜的政治氛围,也大幅度提升了民众对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期待。在此背景下,怎样加快“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真正落实公平正义原则,成为一项牵动全局的、迫切的中心工作。值得指出的是,在各种具体制度和举措的合理化方面,有四个法学领域或者部门法值得给予高度重视,不妨称之为“法治中国的四维”,即:刑事法、税法、侵权责任法以及行政诉讼法。

一、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基本思路

京津冀区域要实现快速协同发展,必须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立足现在,就是要充分利用京津冀区域的现有基础条件和资源禀赋状况,或强强联合,或优势互补。面向未来,关键是把握这个时代赋予的重大机遇。

第一,立足比较优势错位发展,释放区域合作红利。北京最大优势是首都优势、智力密集、全国交通枢纽、市场容量大,是政治、文化、国际交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天津最大优势在于港口优势、制造业优势、科

释放合作红利,增强内驱动力,实现重大突破——

找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利益契合点

叶堂林

技教育优势、空间发展优势和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河北最大优势在于资源优势和重化工业优势。从京津冀三地未来的发展重点来看,北京更多体现在用“头脑”,其重点在于科技创新、设计研发;天津更多体现在用“双手”,其重点在于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向自主研发的智慧经济转型;河北发展则更多地体现在从资源密集型、加工装配向技术集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转变。京津冀三地应发挥比较优势,扬长避短,错位发展。京津合作主要是资源合作、生态合作和产业链条布局的合作,构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研发、设计、营销、制造业产业区,北京保留研发、设计、营销环节,制造环节放在河北。应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区域产业合作与整合,释放区域合作红利,实现京津冀区域的快速崛起。

第二,寻找京津冀三地的利益共同点,增强区域协同发展的内在

驱动力。寻找京津冀三地的利益契合点是实现区域合作的关键所在。我认为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找到利益契合点。一是从急迫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以及区域面临的共同问题中找到利益契合点。如破解“大城市病”,靠单个城市自身难以解决,只有在区域范围内才可能加以解决的问题;又如治理雾霾、生态环境建设、区域交通体系建设等,必须大家共同联手加以解决。二是从三地发展诉求中寻找利益契合点。北京更多的是寻求发展空间,天津最需要的是提升发展质量,河北最需要的是发展机会。城市之间各有优势,也互有诉求,存在合作的内在动力。三是从共同目标上找到利益契合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天津建设北方经济中心和河北建设北方沿海大省,与京津冀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是一致的。根据国家制定的京津冀区域规划的顶层设计,京津冀三地应找准自己的功能定位,将地方发展战略、规划与顶层设计进行对接,从中可以找到各自的发展机遇、发展空间

以及实现路径。

第三,抓住战略机遇,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实现重大突破。京津冀地区面临一系列重大机遇,如中央将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机遇,这有利于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和行政区划的藩篱,站在国家战略和区域整体发展的层面,对京津冀区域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并在财政体制、投资体制等方面进行政策配套,这无疑给全面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最有力的制度保障。北京率先迈向后工业化社会,其产业转移与升级,城市功能疏解以及京津冀三地正在进行的空间结构调整,都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契机和条件。我们应抓住这些重大的战略机遇,在全国率先走出一条“协同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发展互补互促、资源要素对接对产、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联防联控”的路子来。

二、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重点

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需要确定一些发展重点。我个人认

为,不妨把以下方面作为战略重点。

一是以中心城市功能疏解为契机,打造多核心、网络化、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已经处于城市功能疏解的关键时期。要疏解中心城区的人口压力需要坚持合理控制中心城的建设规模和开发强度,加大中心城区对人口的向外推力、增强新城对人口的吸引力,以推力与拉力共同作用实现对城市功能的疏解,以城市功能和产业的疏解带动人口的疏解。中心城区功能疏解应着眼于整个京津冀区域视野进行,从而实现区域内多核心、网络化城市群的形成,最终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

二是完善新城功能,提升中小城镇的集聚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针对京津冀区域新城及中小城镇发展中存在的集聚力不足、城市功能不健全等突出问题,建议从完善新城及中小城镇的功能入手、增强新城对中心城人口的吸引力、加快北京和天津新城建设;实现以业兴城、职住挂钩,促进新城“有城有业”平衡发展;改善新城生态宜居环境,提升新城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的建设和运行质量。

三是培育京津冀新增长点,优化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增长点是区域发展的引擎,具有较好的发展条件、发展势头和发展前

景,与区域中其他地区相比,具有更高的增长性和更强大的扩散性。特别是那些面临重大机遇的地方,一旦抓住机遇,就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如北京的通州、大兴的临空航空城、海淀昌平的未来科技城、天津滨海新区、武清开发区、北辰东丽的天津北部新区;河北的石家庄正定新区、廊坊固安航空新城、沧州渤海新区等,都有可能成为京津冀区域发展的新增长点。

(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本文为北京社科基金项目“北京城市功能疏解与首都圈城镇体系研究”成果)

道德当身,不以物惑。

——管仲

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

——陶行知

遵照道德准则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

推荐者
河北 王季

我推荐的 道德格言

理论周刊

学习与答疑



指挥如意
曾绍杰 作



不学则老而衰
黄稚松 作